

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主题学研究

孟昭毅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以后,形成了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中国文学史领域的主题史研究,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这四种趋向。在经历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定型后的三十多年之后,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研究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关键词:比较文学;30年;主题学

中图分类号:I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2-0133-07

主题学是有学理基础做支撑的,它具有独特的本体论意义。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以跨异质文化为本质特征,以跨诸多学科为表象,从而表现出网状思维、星云式联想上的优势,以及追根溯源式的树根型考察,给人一种广可纵横捭阖,深可探源索迹的学术视域。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是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学科、跨越文化等多种界限的关于主题、母题、意象、原型、题材、类型、象征方面的中外文学关系与联系的研究。比较文学主题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中国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以后,形成了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中国文学史领域的主题史研究,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这四种趋向。在经历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定型后的30多年之后,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研究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趋向,最先发轫的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

当比较文学主题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进入海峡两岸的学术界时,作为一种自发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应该可以说此前早已有之。因为既然主题学源于欧洲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那么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显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源可利用。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应该有深广的学术基础,更何况当时正值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大背景下,中国相关学者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对西方主题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的思考、利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坛就开始出现王国维《〈红楼梦〉评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具有中国色彩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也出现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钱南阳的《祝英台故事叙论》(1929)、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等一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有关主题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了西方主题学和类型学理论的影响,海峡两岸的主题学研究有了复兴勃发之势。季羨林的《罗摩衍那初探》(1979)、钱锺书的《管锥编》(1979)、台湾陈鹏翔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杨宪益的《译

收稿日期:2016-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12BWW007)

作者简介:孟昭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

余偶拾》(1983)等人的著作就成为这一时期主题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在此基础上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1984)、台湾师范大学金荣华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1984)、《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007)、陈岗龙的《〈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的一大原型》(1995)、《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2003),以及李丽丹的《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研究》(2013)等人的著作,主要代表了西方传统主题学研究范式在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主题学研究中的重要成就。

刘守华自1956年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以后,开始走进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领域。他曾先后写过150余篇相关的论文和3部涉及中国民间文学的专著:《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1991)、《中国民间故事史》(1999)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主编,2002)。这些著述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自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开始,至1993年他共发表了近30篇有关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文章。此后均收入其代表性著作《比较故事学》(1995)。此书就是利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类型学、文类等研究方法,对中外故事中的主题、母题、题材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有3组文章是属于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跨国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有一组文章属于跨越民族界限的民间故事比较,还有以民间故事口头传承方式进行的跨学科比较以及中外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等。总之,他的《比较故事学》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他着重在民间文艺学范畴里,专注对民间故事这种文体进行研究,对某一故事的流传演变轨迹进行地域和历史上的逐本求源式的考察,以找出故事的缘起与流布,以及不同地域的变异等。另外,刘守华还按不同类型的故事母题索引对这些民间故事予以研究鉴别,将故事研究纳入文化艺术科学序列。这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范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开拓。

第二种趋向,西方主题学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延展形成了主题史研究。

这是一种以舶来品的主题学理论重构中国文学史现象的阐发式研究。例如以王立的《中国文学主题学》(1995)、宁稼雨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2011)等为代表的运用主题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探索;以谭桂林的《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2002)、王春荣的《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学研究》(2007)等为代表的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所进

行的题材史和主题史研究等。

论及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话题,绕不过去的人物是王立教授。他先后集中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十大主题”、“九大意象”,尤其在复仇、侠义、悼祭等主题上的深入研究令人叹服,这种以主题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胆突破与创新,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他的一系列主题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学主题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和《文人的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的十大主题》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台湾主题学研究的先行者陈鹏翔曾评论说:“王立先生是中国大陆利用主题学的理念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最有成就的年轻学者”,“王立教授这几本著作是我们研究主题学史的必备教材或参考书”^{[1](P序言)}。至今以主题学的理念和方法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惜时”、“相思”、“出处”、“怀古”、“悲秋”、“春恨”、“游仙”、“思乡”、“黍离”、“生死”十大主题,以及“柳”、“竹”、“雁”、“马”、“海”、“石”、“黄昏”、“流水”、“梦”九大意象,以古人传统的“穷搜博访”和“比类相从”的方法,几乎是穷尽式地从源到流,或从流溯源,进行题材史、意象史式的爬梳,给人以重构古代文学史的印象。正如有的学者对他主题学研究的评价说“无疑,王立所建构的中国文学主题学大厦已经不是顾颉刚先生当年主要在民俗故事领域所应用的那个主题学了,王立其实是广泛地吸收了原型批评、单位观念史学、心态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故事学和美学心理学、形象学等多种新理论,予以改造移植,在中国文学的主结构上运用。”^[2]王立在自己的主题学领域里进行旁征博引的研究,汪洋恣肆地从线性管状思维演绎到平面网络式思维,努力建构起立体多维化思考的主题和意象体系,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综合研究“另辟一条新蹊径,另开一个新生面”^[3]。对王立的研究夸赞有加的陈鹏翔不得不承认:“他在国家文学内对柳树、竹和雁等九大意象‘史’的开拓溯源,又将我在《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1983)一文中把中国主题学的根源追溯到郑樵在《通志》上所说的一段话,再往前追溯到六朝梁太子萧统所著《文选》中关于主题分类,且有把我在《主题学》一文中所主张的主题学的研究应探讨主题与作家以及与时代的关联这种抽象的理念具体实践了,这不能不令我感到钦佩。”^{[4](P序言)}但在同时他也指出:“王的主题学研究系于中国古典文学之内,跟我们搞中西比较文学所倡导的比较研究虽仍有距离。”^{[4](P序言)}即他认为王立的主题学研究,因为在一国之内,且有主题史和意象史的色彩,和他理想

中的跨国界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还不完全相同。

第三种趋向,发展壮大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成果。

这些学者大多为海峡两岸第一批以中外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专业学者。主要以乐黛云、孙景尧、陈鹏翔、谢天振、陈惇、刘象愚、刘介民、曹顺庆、王志耕等为代表。

“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专门术语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远。台湾学者陈鹏翔自称,20世纪70年代末在港台地区他和马幼垣、李达三等人最早使用了“主题学”一词。大陆学者在专书专论中提及“主题学”的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的卢康华、孙景尧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1984)和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1988)。前者在“平行研究”一节中用了1200多字的篇幅概括了“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如‘爱情与义务的冲突’,‘人生短暂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爱情战胜死亡’,‘有生化为生’等等。”^[4]文中列举了大量中外文学中表现相同主题的作品进行说明。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条件和篇幅所限,这种“主题学”的理论定义和研究实践都论述得不够充分、具体。

关于“主题学”的理论,大陆学者在教材中论述较早且较充分的是乐黛云。她在1985年由深圳大学比较研究所编辑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比较文学的名与实”中写道:“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5](P2)。可以看出乐黛云当时是将“主题学”归入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一类的。她在《比较文学丛书》之一《比较文学原理》第五章主题学的写作中,用了23000余字对“主题学”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阐发。首先,她对“主题学”的发展演变史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推论直至维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中用“整整一章研究主题学”时,“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才逐渐成为定论”^[5](P90)。其次,她在论及主题与主题学的关系时,认为素材是原始材料经过加工写入作品后才成为题材。“题材所显示的信号就是题旨,或称‘母题’。”“题旨(或母题)是可以从题材中客观地抽取出来的,它是一种可以在多种主题中多次出现的因素。”而“这种深藏在作品底层的作者对生活及他所描写事件的总的看法就是主题。”^[5](P91)就是说她主张主题可以由一个题旨(或母题)构成,

也可以由几个或更多的母题构成。另外,她还指出“第一,关于‘主题’本身的研究。这是一种微观角度的研究。”属于各个民族文化体系内的基本问题。“第二,是关于主题学的分析。这是一种宏观角度的分析。”属于对不同民族文化体系外共存的同一主题所进行的分析。再次,她在书中对主题、题材、母题、意象等的比较进行了细化与阐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大量列举了中外文学作品中相同的主题、题材、母题、意象甚至套语的异同、嬗变、相互影响和发展衍变等。第四,她提出主题史和题材史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较早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书中论及顾颉刚和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27);从“昭君和番”到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的《王昭君》(1923)等。这种从题材史发展为主题史的研究已成为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景象。当然还可以对“不同文化系统的主题和题材的发展系列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最后,她在书中提及主题学和原型批评的关系时认为,“‘原型’,指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主题、母题、题材、人物、文类等。”^[5](P115)并进一步指出:“通过原型批评,主题学进一步与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而发展向更高的层次。”^[5](P122)乐黛云可谓第一位在教材中普及深化主题学的学者。

另外,一批比较文学教材和刘献彪主编的《比较文学手册》(1986)、上海外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1987)等相继开始介绍主题学。但是大陆学者系统介绍主题学理论的是谢天振先生。他在1987年由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和暨南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比较文学研究》季刊第四期上发表了16000多字的关于“主题学”的专题论文。他在文中首先对“主题学”一词在国外的产生,传入国内的时间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其次,以具体事例对“主题学”的产生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阐发。再次,对“主题学”的定义等属于本体论范畴的内容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外到国内的厘清。文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主题学”研究对象的分类。因为国外学者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导致作者耗费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例分析来说明主题学研究的不同分类标准和内容,主题研究、母题研究和情境研究的具体策略与方法等。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为当时的大陆学者研究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学科基础。10年之后,他在和陈惇、孙景尧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

中,又重新撰写了“主题学”一章,20000余字。就这样,中国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研究,尤其是中外文学中的主题研究一发不可收。

台湾学者陈鹏翔对于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实践推广而言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当代“旅台马华作家”的代表,其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在台湾马华作家群中颇有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并积极推广主题学的理论与实践。他在博士论文《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中就开始运用主题学的理论来研究中英诗歌里关于“秋天”的母题。从此开始了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相关著述有《主题学研究论文集》(1983,2004年新版)、《主题学理论与实践》(2001)。他的主题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首先,他有较强的学科意识,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从自觉建构到自觉实践,思路很清晰。比如他在《主题学研究论文集》的前言中,对所收21篇文章有个总的说明与评价:“为了使主题学的某些层面更加透彻,这里也收了一些不尽是从比较文学立场出发的文章,作为一种印证与延伸,有些甚至只可视为主题史的研究;但是,它在考证某一主题的源流或在立说上颇有可取,可为真正的主题学研究奠基。”^{[6](P1)}他很清楚这21篇文章中不全是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有些甚至只可视为主题史的研究”,但它的方法“可为真正的主题学奠基”。他的所谓“真正的主题学”即是比较文学跨国家界限的中西文学比较中的主题学。其次,他在自己的文章《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中,对主题学在西方和中国学术史上的发展做了简单的梳理,并对主题学进行了界定:“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原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愆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6](P5)}他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举例说:“令人感到嘲讽的是,追随顾氏之后的学者在做主题学论文时,要不就是未注意到他的贡献,要不就是未拥有他见著知微的洞察力,只顾考证故事的增衍异同,而未及探寻其孳乳延展的根由,落入早期西方主题学研究的巢臼中。”^{[6](P7)}意思是说希望研究者要从故事主题或母题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处理上来了解故事作者的心态和胸臆,并考察故事所反映的时代的真实面貌。再次,作者在文中还对主题学和一般主题研究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主题学是比较文学中的一部门(a

field of study),而普通一般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则是任何文学作品许多层面中一个层面的研究;主题学探索的是相同主题(包含套语、意象和母题等)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作家中的处理,据以了解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用意’,而一般的主题研究探讨的是个别主题的呈现。最重要的是,主题学溯自十九世纪德国民俗学的开拓,而主题研究应溯自柏拉图的‘文以载道’观和儒家的诗教观。”即是说主题学的研究“可经由剖析分解故事的途径,进而来揣测作者的用意。”^{[6](P15-16)}最后,在作者将主题学的范围从民间故事拓展到中外抒情诗时,“则意象和套语(topos)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并明确指出:“这些意象和套语都是大大小小的母题,是组成一篇作品的重要因素。”^{[6](P21)}接着他又指出:“母题我认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断出现的意象所构成,因为往复出现,故常能当做象征来看待。”^{[6](P24)}他的结论是,“我认为在中英古典秋天诗、中西处理及时行乐这个母题的诗中,经由结构的分析组合,然后给它们找出转化的规律是相当可行的。中国秋天诗所要表达的主题无非是悲愤,……而英国古典秋天诗所著重表达的主要是时间的压迫感。”^{[6](P29)}至此,作者从中国文学中的主题学研究,最终落实到中英比较文学具体的母题与主题的研究,并对主题学的主要元素、主题、母题、意象、象征、套语等一并作了自己的解释与阐发,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实践,为后人留下不尽的启发与思考,影响了海峡两岸诸多的主题学研究者。

陈惇、刘象愚两位在国家教委“七五”高校文科教材《比较文学概论》(1988)一书中用了一节,近9000字的篇幅重点对“主题学”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作者首先从历史沿革和术语形成两个方面对“主题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说。着重指出:“比较文学中的主题学并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题研究,它包括对题材、主题、母题、情节、人物、意象等方面的研究。”^{[7](P243)}这就厘清了主题学与主题二者研究范畴的区别。其次,作者又指出:“主题和母题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混用,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主题是通过人物和情节被具体化了的抽象思想或观念,是作品的主旨和中心思想,……而母题则是较小的、具体的主题性单位,一连串母题的结合就构成了作品内容的框架,从中可以抽象出主题。”^{[7](P243-244)}显而易见,作者认为母题小于或等于主题,而“主题包括了母题。”再次,作者认为:“用典型人物来

命名主题,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概括性。主题不仅从典型人物中抽象出来,也从形势中抽象出来。”并在文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西方评论家的一些观点,即“把主题只和人物联系在一起,把母题只和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作法是不可取的,至少是不全面的。”^[7](P244-245)作者的这种批评并不源于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对主题学理论的一种深刻解读和大量实践的基础之上的。第四,作者指出:“意象是情节和事件中更小的单位,作品中的细节描写、比喻、暗示、象征、双关等形成了一系列的意象。……只有当意象作为一种中心象征,与作品的主题发生紧密关系时,才可以成为主题学研究的对象。”在对意象与主题的关系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之后,作者又对题材提出了主题学意义上的要求。“题材是作品的素材,尚未经过作家的处理。……题材的上面是情节、人物和一定的艺术形式;再上面一层是从具体的情节、人物中概括出来的一系列母题;母题上面的最高层次是作品的主题。”“主题学即是以作品的这四个层次为对象,于是有题材研究、人物研究、母题研究、主题研究等。”^[7](P246)这两位作者清晰地描述了文学作品在主题意义上的四层结构,并分别对应着一种主题学研究的范畴,这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有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学理意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者强调比较文学主题学:“既可以对不同的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主题作平行研究,又可以对一种题材、人物、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民族中流传演变作历史的探讨。”^[7](P247)即是说主题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个别作品中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和主题,而是研究同一题材、同一情节、同一人物、同一母题、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变历史。这就将比较文学的主题研究和一国或民族的主题史和题材史的研究进行了区分,而在我国有不少学者研究的成果属于后者的范畴。作者还有意对上述各层次的研究进行举例分析,使这些研究范畴有了“国际性”。例如指出“典型人物的比较研究是主题学中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个方面”。而美国学者列文的《吉珂德原则》则是一篇值得学习的范文。因为“从本质上讲,鲁迅笔下的阿Q正是一个东方的,或者说是中国的唐吉珂德。他在许多方面符合‘吉珂德原则’。”^[7](P251)于是尽管二者是不可混合的艺术形象,但民族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从主题学研究角度分析,就具有“国际性”的特征,从而可以符合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学理要求了。

刘介民在《比较文学方法论》(1995)的第五章“比较文学理论之平行研究”中论及的第一种方法即

“主题学的方法”。虽然他的论述只用了3700余字,但是他的观点极其明确。首先,主题学是平行研究的一种首要方法。其次,他对主题学进行了本体性意义的界定:“主题学就是从‘主题’(Theme)及‘母题’(motif)入手,研究文学作品的国际关系;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他还进一步指出:“主题学基本是属于平行研究,而主题研究则为法国影响研究所盛行。”^[8](P243)再次,文中指出比较文学“它探讨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过程及其演变,和那些充分体现文学特质的主题、典型和传说。当然,民俗学与比较文学也有相接的情况,尤其是某些主题学的领域”。在这里他指出了民俗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和领域有叠加之处,这也正是西方早期民俗学不被正统的比较文学接纳而后又进入平行研究的契机。因为“这些主题,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取舍,也可能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找见相似之点。用这些方法进行对比与比较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有很多是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相似现象。因此,比较文学由影响研究走向了平行研究。”最后,他还指出,“每一时代的作家都在主题上翻新新意或创造出某些琐节。主题学的方法要研究这些与主题的相互取舍关系、主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8](P244)其最后结论是:“可见主题学的方法,已从德、法题材史、主题史的研究转向国际文学的平行研究。”^[8](P248)而这恰恰是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最早是由民俗学、民间文学萌芽,最终归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原因。

第四种趋向,21世纪以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已初显端倪。

21世纪以来,在大量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主题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新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有孙景尧主编的《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2006)中对主题学理论的阐释与解读;美国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的《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2010)中则有不少关于跨文化比较中的主题学的理论问题。2011年由本人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第5期作为特邀主持人发表了“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系列文章。2014年台湾学者现受聘于复旦大学的张汉良先生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中的《透过几个图表反思“文学关系研究”》一文中提出主题学的学理基础,即“发生学的接触”与“类型学的平行”等问题。这都表明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日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显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新的成果,并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许多学者一直都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变化,一直处于比较文学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的前沿。他们对主题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连续性的思考,在大量理论思辨和研究实践基础上对主题学从本体论定位到认识论定性;从方法论入手到实践论践行,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创新。尤其是在“一代博学鸿儒”钱钟书治学方法的影响下,都希望像他一样能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学的学术大厦。

古人云:“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言外之意就是说,只有对“史”的“通”,才可有“思”之“变”,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开篇,即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并用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这种学术思想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有一种“打通”的思想主脉,即“打通古今”、“打通中外”、“打通学科”,在这种“三通”之中形成他的思想之变和思维之辩。他在自己的书中以深厚的学养、大量的典籍和难以辩驳的批评理论,说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家能够创造出的相近或相似的思想内容,主题意象、情节结构、类型文体等的艺术作品。他将《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化鱼的记载,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一事相比较,得出“变形”是形象思维共通、共同的“艺术规律”^[9](P568)。而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则也能提出心领神会、文化心理结构相同、文艺观点共通的见解。他将鲍照的《舞鹤赋》与德国席勒、英国叶慈等人的作品比较,证明中西文学规律也有相通之处^[9](P1312)。钱钟书在中外纵向历史影响和横向现实影响的互动关系中,将大量的有关文艺作品的意象、题材、母题和主题的学术探讨,深化为在人类思想史、精神史上的鲜活亮点和哲理追求,这都是后人难以企及,但大受启发的。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2015年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比较文学概论》。在这部最新著作的第五章“文学的类型研究”的第二节“文学主题与主题学”中,用了34000余字的篇幅对“主题和主题学的联系与区别”、“主题学研究的分类”、“主题学研究的主题”、“主题学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四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的阐发。并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基本廓清了类型学、主题学与文类学这三者各自的学术疆界和独有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之后,本章明确指出:类型学、主题学与文类学既属于平行研究,又属于影响研究,这是本教程结构上的一大创新。”^[10](P185)但是作者也在继后的论述中明确指说:

“正是这些具有动态特质的母题、题材、主题,使主题学研究始终充满活力。它们不可能被任何界限所束缚而成为专有物,恰恰相反,它们会越来越活跃,成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中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至于在运用这些主题学的构件时,使之进入平行研究或是影响研究领域进行探讨,则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定,不可先入为主。”^[10](P207)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比较文学概论》主编、首席专家曹顺庆教授在201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署名文章“构建比较文学研究的新体系与新话语”中,论及“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创新之处时就以“文学的类型研究与比较诗学”板块为例,评价它“囊括了‘主题学’、‘文类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打通了以往教材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严格区分的结构,解决了比较文学教材以往的结构难题。”就是说类型学研究中的主题学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严格区分,其实它不仅打破了比较文学教材的结构难题,而且打破了比较文学主要的两种研究方法,即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间学理隔阂的樊篱,因为这正是文化之间转向的结果。主要是在异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发现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确存在共通而又共同的主题。所以这些相同的主题既不是平行研究中的文化间的比照,也不是影响研究中的文化之间的沟通,而是类型学研究中的文化之间的转向,于是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主题最终会整合为一种异质文化相互叠加交叉的契合点,成为一种关联性的产物,这才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所在。

以“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标志,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正在表现出如下特点:(1)以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和中外文学比较中的主题学研究实践上;以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为主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主题学的题材史和主题史的研究实践上。(2)前者侧重于主题学研究,即内容上狭义、范畴上广义的世界文学国际性的类型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后者侧重于主题研究,即内容上的广义、范畴上狭义的国内民族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3)这两大群体都在努力表现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即在理论和实践上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在中国主题学研究的实践上建构中国两岸学者认同的比较文学主题学理论,并开始在世界

比较文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鹏翔.主题学研究回笼[A].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 [2] 吴相洲.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学主题学研究——从王立教授的三本系列专著读起[J].北京大学学报,2000,(2).
- [3] 董乃斌.序[A].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 [4]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76.

- [5] 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 [6] 陈鹏翔.前言[A].主题学研究论文集[C].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1.
- [7]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8] 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9]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0]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比较文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向博】

Thematic Study of Chin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irty Years

MENG Zhao-yi

(College of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1970s to early 1980s, after entering the academia across Taiwan Strait, the thematology of Chin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formed four trends: thematic study of folk lore and folk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theme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matic study in parallel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matic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ty years after it became an established discipline, Chin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score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bot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rty years; thematology

~~~~~  
【上接第102页】

##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Yan'an Period

ZHANG Xin-biao, LIU Zhuo-h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In Yan'an period, CPC commemorated and propagated characters such as great people,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and heroes. Through this special discourse system, CPC effectively interpreted and publicized the party's ideal and faith, nature and objectives, and revolutionary tasks and so on. Besides, this discourse system enabled CPC to build a strong spiritual pillar, gather strength,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ideals and beliefs for CPC to lead people to seize the state power.

**Key words:**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an'an; commemorate; ideals and beliefs